

第一章

框架

20 世纪 50 年代的陕西农村，无论在何处，社会性别都是一条重要的差异轴线。即使是标准的、有社会性别指向的行为的内容发生变更时，这种情形也依旧如此。但社会性别本身与地点的具体所指及世代之间的差异缠绕在一起。其他主题也与社会性别一样，切割、有时还打破了那种严格将妇女纳入特定的角色和有序发展的时间的分类法。本章对以下许多故事进行架构并关注其中的四个主题：地点的重要性、档案的局限性、聆听者和讲述者的独特性、以及记忆带有社会性别指向的特质。

地点：“一切社会主义都带有地方性”

在我们所采访的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力求理解社会主义的特定意义，特别是对那些记得 1949 年之前的时期、但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集体化时期度过的妇女来说，社会主义有何特定意义。各地在大小、男女比例、作物、社区规范、领导力、以及容易接近程度等各方面存在的差异（见表格 1），时刻都在提醒我们，“中国”这个词不过是一个便捷的简称，是一种组织我们的教学、写作和理解历史及当代政治的方式。在漫长的 50 年代，治理这些村庄的党和国家正在力图使“中国”处处同等、均匀划一，并让国家的势力触及到每一个村庄，尽管与此同时国家也在对城市与农村生活之间的差异进行体制化。国家之所以强有力，部分是因为它成功地深入到了农村地区，依靠的手段则主要是发动地方群众，而非动员上层。已故的美国众议院议长小提普·奥尼尔（Tip O’Neil）曾说过一句名言，“一切政治都带有地方性。”那么，我们一直以来谈论“中国”

表格 1 一份 1940 年的民国政府报告提供的四个村所在县的人口统计数字

县	户数	总人口	男性人口	女性人口	男女比例
渭南	49,607	226,255	112,743	113,512	99
合阳	32,942	143,627	72,840	70,786	100
南郑	52,740	275,384	145,215	130,169	111
山阳	31,226	140,151	75,901	64,250	118

Z 村在清代和民国时期隶属于山阳县。1949 年以后，丹凤县设立，Z 村即成为丹凤县的一部分。一份 1951 年的丹凤县报告显示：该县总人口为 163,141 人，其中男性人口为 85,451 人，女性人口为 77,690 人。（民政厅 198-381 [1951 年]，陕西省档案馆，第 139-46 页）。有关渭南和合阳县在民国期间的边界变化问题，参见渭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6 年：第 19-21 页。

资料来源：陕西省民政厅 1940 年，未注明页码。

各个村之间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亦不尽相同。B 村和 G 村所在的关中地区以旱地培植小麦和棉花为主导。干旱是主要的“自然”灾害形式。陕南兼有水稻栽种地区（T 村）和多山地区（Z

村），容易遭受洪灾，尽管也有干旱问题。有关在本书讨论的时期内 Z 村的洪灾问题，参见《陕西省丹凤县水利志》1990 年：第 53-54、58-62 页；关于干旱问题，见第 70-73 页。

的习惯亦遮蔽了一切社会主义都带有地方性的程度。即使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颁布的最具指示性的法令，也必须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被贯彻实施，由当地干部根据特定情境对法令作出阐释、修订、强调以及改变。无论在何处，国家政策的实施都取决于地理环境、事先的社会安排及当地的具体特色。

例如，渭南县的 B 村坐落在渭河以南几公里的关中棉花种植区，每家每户都紧挨在一起，对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了如指掌。T 村则情况相反。T 村位于靠近四川边界的南郑县——陕南一个产大米和茶叶的地区，村里的房舍散布在稻田和山路之间。¹ 在 B 村所处的关中地区，人们常说陕南——即 T 村所在地——的女人们性生活放荡，分散在邻居们无法看住她们的地方。陕西丹凤县西南的 Z 村靠近河南，村里住在市集中心的人家则看不起那些住在山里的人家（说他们“又穷又落后”），住在山里的也瞧不起那些住在市集里的（说他们是“肮脏的商贩，不是诚实的庄稼人”）。Z 村坐落在陕南东部边缘丹河和银花河汇聚的地方，一直以来都是桐油、核桃、板栗和药草等山货的交易中心。² 合阳县的 G 村，位于近黄河的关中东北部边缘位置，黄河的另一边则是邻省山西。深邃的峡谷在松散的黄土地上刻画出 G 村的地貌。棉花种植方式、本土纺织、随处可见的当地戏剧、以及一直以来水资源的匮乏都影响了当地的家庭经济和社会交往模式。³

还有一组受访对象是按组织而非地理位置联系到一起的：20 世纪 50 年代被派去跟农村妇女一起工作的妇联干部。她们虽已退休，但却依然认为提升妇女的地位十分重要。尽管提高妇女地位曾是全国各部门力图实现的目标，但陕西妇联对贯彻这个目标投入了最大最持久的热情。和我们采访的大部分农村妇女不一样的是，妇联干部身居带薪岗位，在各地间奔波辗转，并要经常应对由自己常年不在家而引起的各种家庭状况。和农村妇女们一样，她们谈起过去的时候，强调的都是她们如何尽职尽责地辛苦工作。她们在记忆中寻找建立集体化、特别是扩大妇女地位的事业，这项事业曾经塑造了她们的成年生活，但现在却遭到公众的怀疑或漠视。

在社会主义的头几年，来自上层的国家当局发布的诸如“公有化！”、“勿将婚姻看成商品交易！”、“放弃副业 [如纺织]，为集体工作！”等指令由党和国家各色各样的行动者们进行传播，抵达各式各样的社会土壤并产生多重效果。通过重新安排空间和重新校准时间，国家效应透过地方上的关系和

¹ T 村简报，1997 年。

² 陕西省丹凤县交通局 1990 年：第 7 页；Z 村简报，1999 年。

³ 2001 年，G 村有 600 户家庭，2700 口人。该村位于金水河下游地区、武帝山脚下，金水河为黄河支流。截至 2001 年，该村耕种的平地为 7,705 亩，近大坝的坡地 2,000 亩，沿河的土地为 200 亩（G 村简报，2001 年）。一亩为六分之一英亩。弗美尔（Vermeer）1988 年：第 227-28 页简要描述了关中平原灌溉区（包括 B 村）与干旱的丘陵地区（包括 G 村）之间的差别。有关 1910 年代的合阳，见台克满（Teichman）1921 年：第 80 页。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棉花种植的重要性，见顾执中 1932 年：第 195 页。当时合阳县与邻省山西有很紧密的经济联系，并主要出口棉花和草药（第 201 页）。有关 1949 年后共产党在该县的主要措施，见中共合阳县委组织部 2000 年。关于 B 村和 G 村所在的渭南地区从 40 年代到 90 年代物质生活（服饰、饮食、居住、交通、节日）的概述，见渭南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6 年：第 769-78 页。

习俗得以实现，并被地方上的理解所固定。历史学者们很容易想起的词语如“农村”、“革命”、以及一些政府运动的名字，都是制定顺序的装置，被强加到各种大相径庭的环境之中。接下来的章节并非呈现四个独立的个案研究，而是从我们采访的所有村庄中提取材料，但每章的故事都保留了各地在地理环境、社会关系和有社会性别指向的工作上的具体特点，以提醒我们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并非铁板一块。

档案

历史学者并不能自己选择在何种条件下写作。如果时代久远并且研究对象已逝，我们唯有依靠文字记载和实物器品。如果能够与见证或者是参与了过去事件的人进行交谈，并想仅仅通过询问和记录就使“不可见的变为可见的”——这样的研究计划虽具诱惑性，但却不切实际。口述资料和文字材料一样都是支离破碎的；两者中任何一个都不会完全可靠。这两种资料都对本项研究计划至关重要，这并不是因为两者结合到一起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关于过去的确定性记录，而是因为每种资料都在特定情况下产生，并携带着这种特定情况的印迹。不同类型的材料之间相互冲撞、忽视或打断彼此。意识到这点对精心刻画一个“足够好的”、但又不会消弭这种不协调的嘈杂之音的故事非常关键。

尽管有关 1950 年代陕西农村的档案记录看似广泛且深入，但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记录对我们关注的问题其实帮助甚微。⁴ 有关集体化时期的出版物——政府通告、报章报道、20 世纪末叫“地方志”的地方史概略（与历史上的方志一样）——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国家运动时间和内容的细节。当我们清楚这些资料是如何编纂而成的时候，它们极为有用。比如，从跟妇联官员的交谈中，我们明白了有关劳模丰功伟绩的故事如何得以发表，50 年代长期驻留农村的妇联干部又是如何从中进行协助。

在使用村、县、省的档案馆材料时，我们格外留意所保存资料的分类和排序：指令、动员令、述职报告，以及大量的内部备忘录。陕西省档案馆的文件干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追踪政府活动的特定线路。⁵ 按事件发生的时间划分这些材料是一项组织原则，但比这一原则更重要的是按等级划分。举例来说，如果主题是政府部门下达的有关《婚姻法》的指令，那么很容易首先找到中央政

⁴ 最近有些被德里达 1995 年的《档案狂热》启发或激发的关于档案资料（archives）和档案（the archive）的激烈讨论，见布拉德利（Bradley）1999 年，奥斯本（Osborne）1999 年；斯蒂德曼（Steedman）1998 年、2002 年。

⁵ 陕西省档案馆收藏了来自省政府各主要部门的文件。档案文件以手工缝制成书，并按政府部门分类（民政厅、农业厅、卫生厅、妇联），有时也按政策举措分类（《婚姻法》），各个部门内部按时间分类。这些书本有些被归为永久保管一类，有些则属于长期保管一类。已经不清楚为何一份文件属于这本书而不是另一本，但这样的区分意味着关于某一特定主题的文件——例如，贯彻《婚姻法》的运动——分散在许多文档中。

北京的主管部门下发指令，省级则向县市各级下达报告打探消息，报告未准备就绪时便对各县市实行威逼；省级亦传达上一级的指令，制定出各县实施这些指令的方向。报告也会往上呈递。当好几个部门都关心同一项事务时（比如《婚姻法》）时，横向传递的情况也会发生。各个部门要么发表联合通知，要么互相保留各自文件的复印件。

府的文件，然后是地区政府的，⁶再后来是省、县等政府的。这些档案文件清晰记录了各级政府产生的公文，而对一份公文发出后产生什么了效果的记录却没有那么清楚。和所有档案馆资料一样，需要跳开文档本身的逻辑才能搜集到各级政府之间的互动的信息。

国家的档案分类使其力求要管理的对象变得支离破碎，有时还掩盖了党和国家本身的运作方式。民政厅关注包含《婚姻法》在内的许多事务，但厅里的文件却对与婚姻法同时进行的扫盲课未作任何讨论。扫盲课和婚姻法是影响 50 年代初期农村年轻妇女生活的两项最重要的制度，而妇女的阅读能力可以让她们有法律意识——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农业厅负责农业技术方面的事务，于是从长达数千页有关“大跃进”的文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每个县每亩棉田用了多少吨肥料。但这些文件对公社大食堂却只字未提，尽管当时陕西省的农民都应该是在大食堂吃饭的。这些资料中没有出现任何有关社会生活的持续报道，有的不过是一系列折射人们活动的政府棱镜。尽管所有的档案资料可能都是这种情况，但考虑到党和国家在集体化时期曾制定明确目标要创造新社会和面向新的社会主体，如农民和妇女，并要通过集体对农村的社会和经济生活进行整体变革，那么没有社会生活方面的报道就尤为让人惊讶。

在对“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进行研究时，社会生活被支离破碎地纳入官僚式记录的情况就变得尤其显著。当时中国农民的绝望被完整记录在档；**最常听到的数字是三千万农民被饿死**。尽管所有报道皆表明陕西绝非受灾最严重的省，但民政厅 1962 年到 1963 年的文档充斥着由干旱、洪水、虫害等引起的骚动事件。⁷书写这些文件的纸张的质量凸显出里面的内容：印有各个政府机构名字的奶白色光滑纸张被换成了类似鸡蛋盒的灰色纸。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文件中出现的紧急困境与同一时期农业厅档案记录的振奋人心的产棉会议的报道没有丝毫联系。学者们已经深入研究了这一时期中央政府的决策与地方现实之间的断裂。然而这里的情况似乎是，即使有部门要求提供物资救助，各部门之间在横向层面上的沟通也可能已被割裂，或者至少没有被党和国家的档案管理员们捕捉到。带着农村妇女问题进入档案的历史学者将会深切体会到党和国家的议程与她自己关注的问题有何不同。

聆听者

口头叙述是我们仅有的关于中国早期农村社会主义各方面的报道，它们也让本书的形成成为可能。⁸正如要了解档案材料是在什么特定情况下产生一样，我们 also 需留意这些口头叙述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被我们听到和收集起来的。

⁶ 建国初期，陕西属于西北局的一部分。

⁷ 自 1959 年起，中央政府向陕西省政府下发紧急命令，要求省政府调查各地区的受灾程度，包括受影响的耕地、灾难类型、死亡的人数和牲畜数以及其他许多指数。省民政局向各个地区索要报告。汉中地区发了一份用密码写成的电报，翻译成文字的意思是，该地区大部分正遭水灾。其他各县递交估算报告说成千上万的群众没有足够的粮食或棉衣过冬。

⁸ 阿敏（[Amin] 1995 年：第 4 页）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警示：“想要从口述历史中发现与档案记录完全不同的材料的希望是很渺茫的。但对我而言，问题不在于使地方上的记忆与权威的记载相对立：历史学家们进入过去的方式是非常有问题的，记忆和

在众多语境因素中，不应忘记我的外国人身份这一因素。1996年8月，我在田野调查笔记中写下第一句话：“回想我如何费尽周折来到这里的经历，既让人懂得谦逊，又让人觉得不耐烦”。在我抵达前，我和高小贤商讨我们想去采访的地方的模样：这个地方要有一个劳动模范，这个地方的妇女要在种棉花和纺织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这个地方还要远离任何城市中心。凭借对陕西农村的精准了解，她联系到区县妇联跟她同一级别的干部，与她们讨论决定一个村庄。地方妇联然后从县政府获得许可——这个过程一般都比较顺利，但也会因意外因素而受阻。例如，在1997年的夏天，有几个县就不愿意接待我们，因为当时香港正在“回归祖国”。这些远离香港的地方官员们并不确定一个外国人在举国欢庆的时刻到场是否合适。

我们从来没有从西安直接去过一个村庄。我们总是途经区政府或者县政府（有时两个都经过），停下来拜访当地官员、受到接待，并带一两个妇联的干部随同我们进村。我将此看成是合法性不断累积和叠加的过程。这样一来，当我们一车人驶进村的时候，所有相关人员都知道我们为何在那里、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对我们负有责任。

我们的到来经常被拿来为当地所用。在我们抵达T村的前一天，妇联花了三百块钱修一条被雨水毁坏的路。⁹ B村的领导欢迎我们，部分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村里的劳模是当地无可争议的骄傲。为了欢迎我的到来，他们号召村民们去拖走了一大堆垃圾。他们非常清楚让有史以来第一个外国人到村里住来几周能够带来什么实际好处。他们问县交通局：“在外国人来之前修好那条进村的路，这不是个很好的主意吗？”当我们在去B村的途中停下来跟县政府官员吃午饭时，我看到一个县妇联来的女人不断巧妙地向一个县外事办公室的官员请求，希望我待在村里期间供电能够持续。那个官员保证会打电话给发电厂，向对方解释我们的“特殊情况”。由于我们在村里待的那段时间平均气温接近38摄氏度，持续供电让村里的人们都可以用电扇，让我觉得自己还稍微有点用处。¹⁰

人们能轻松自如地迎接我们并跟我们交谈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高小贤在省妇联的地位，她在农村地区的多年工作经验，以及我们的到来得到了官方批准这一事实。和大量有关中国的文字中弥漫的不期而遇的浪漫恰恰相反，如果我是单独一个人出现，或高小贤陪同我的时候没有事先通知并得到批准，那么有可能跟我们谈话的人们会更加谨慎和防范。我们一般都是对妇女进行单独访问，有时也用成对或小组访谈的形式。感兴趣的邻居们，主要是小孩子们，有时在附近游荡，他们更多是想看我一眼，而不是来听我们做访谈，但不到一天左右，这种好奇心就减少了。我很少引导提问，尽管我也积极地插话，在访

记载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将问题都展示出来似乎增强了获得一种更加精妙细微的叙述、一种更加浓重的描绘的可能性”。

⁹ T村的简报，1997年。

¹⁰ 对于另一个请求——即村干部们不断地暗示我是否能够帮忙给各色各样的当地企业拉投资这一请求——我却无法满足。到了1999年，当外商投资的发展项目开始进入中国农村时，地方上对外国人也有了更多的期许，开口询问的就不仅是干部了。我和高小贤像往常一样待在一户农家，我们的女房东找到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为当地的医院买一些医疗设备，资助她在屋前的院子养一大群猪，并为她开澡堂提供资金。每一年我都因无法拿出企业资金或无法让村民们理解我并没有那方面的人脉关系而感到越来越为难，尽管我也明白这说明了当地环境的转变，而这些转变跟我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谈的时候和访谈之间向高小贤请教，并在很多个夜晚都与她一边散步一边苦苦思索白天的谈话。开始一项访谈的时候，我有限的方言水平并不是唯一让我踌躇不前的原因。我们想让和我们谈话的老年妇女们处于放松的状态，所以（虽然我就在她们眼前并且远非沉默），但不去不断地提醒她们这样的场合是如何史无前例，这似乎是更为谨慎的做法。通常，过了大约一个钟头之后，我的外国面孔似乎已不重要。

但这并不代表我的外国面孔已被遗忘。在一次访谈中，我们问一个叫乔引娣的妇女有关 50 年代初期她和丈夫在新疆东北部生活那几年的事情。我用中文问她：“你有没有同维族人打过交道？”她明显听懂了我的话，因为她直接就用中文回答了我：也接触。外族人和我说话都不懂。边上也有汉族人懂，给我译，其实还在一块儿那个，见了面你一笑，他一笑就招呼哩。我不懂他们说啥，他们也不懂我说啥。要人译。就像你说话时也要人译一样。¹¹ 几年之后，当我再次回到一个村庄的时候，不止一次地发现我的照片与这些妇女们家人的照片一起被珍藏在玻璃相框里。2006 年在曹竹香家里，我们在一份 4 月 26 日的县报上看到了一则关于她和山秀珍的报道。报道称，曹竹香的名声很大，大到连一位美国记者都于 1998 年来采访了她，还将她的故事写进一本叫《中国妇女》的书里。那个“美国记者”其实是 1996 年的我，你们现在手里拿着的便是我当时正在写的书。（正如高小贤曾说的那样，从这点可以看出档案资料是如何误导人们的。）

因此我从未忘记，作为外国人的我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着我的合作者高小贤以及其他很多人：当地的政府官员；高小贤从她在西安的同僚中招募的笔译员（有一次行程中，她的大女儿也在其中），这些笔译员写下和录下我们谈话的内容，并在每次访谈之后花好几个小时和我认真核对；村里的妇女干部们为我们安排住宿的家庭、找人为我们做饭；当地的抄写员耐心地将方言口语翻译成书面文字，产生了达数百页纸的手写中文采访稿（直到几年后才有计算机中文字处理技术）。写下来的文字稿，无论如何忠实，都不会跟口头叙述完全一样；它们无法传递出语调或节奏上的细微差别，而这些差别在与受访者当面交谈时却很明显，也至少可以部分地保存在录音磁带中。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文字稿，我便远不能确定我是否理解了我们在四个不同村庄遇到的四种陕西方言。

在陕西做访谈使那种——至少对我而言——把外来的研究者看成是隐蔽的旁观者，或看成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调查者，能够独自应对研究工作方方面面的观点变得滑稽可笑。这些在本书被重新讲述的故事无法与收集它们的混乱、复杂的特定情境分离开来，也无法与让我明白自己所作所为的支持机构相脱离。审视我在哪些方面倚赖他人，又在哪些方面同周遭的环境密不可分，而不是试图忽略这些方面，是让人振奋亦是必要的训练。¹²

我们抵达每个村庄后引起的喧闹从来不会持久。地方官员有其他事情要做，没有人对我们去听的那些年老妇女们漫长的故事感兴趣。偶尔会有一些突

¹¹ 与乔引娣的访谈，2001 年。

¹² 人类学者们和历史学者们已就与此相关的两难困境作了发人深思的研究，比如，见王斯福（Feuchtwang）1998 年，寇普爱因（Kopijn）1998 年；威斯维斯瓦朗（Visweswaran）1994 年。雅绍克（Jaschok）和水镜君讨论了类似的涉及一个中国研究者和一个非中国研究者的共同研究计划中的动态关系。

然的官方活动打断我们在村里的生活。某天早上，一群从县电视台来的人突然来到 T 村要拍摄一组访谈，随行的还有好几级官员，一共有二十一人。但我们却基本上被晾在一边。在 Z 村，本来就算县里的官员想来看望我们，他们也无法成行：我们来了之后，那条从四十公里以外的县政府进村的道路在一次暴雨中被冲垮了。¹³ 对当地农民简单呼作“上面”来的官员而言，农村并非他们喜欢逗留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身居官位的人来听过我们访谈，带我们去见具体的访问对象（除非我们提出请求），也没有任何官员告诉老年妇女要说什么，或记录她们说了什么。我们的受访者毫不掩饰她们对国家政策、过去和当下的批评，也愿意将她们与家庭成员、邻居和官员的矛盾和盘托出。我们受益于一种常见的现象：人们会选择对一个外人说出他们不会对隔壁邻居说的事情，因为一个短居的外人是不会将他们的秘密对当地人讲的。许多人都将“有记录备案”的讲述理解为一项重要的活动。每个人都以各种方式表明他们对谈话持严肃认真的态度。

本书行走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的方法论边界，并为作者提出各种伦理上和实践上的两难困境。历史学者致力于展示资料来源，通过将研究对象固定在时间和地点上从而为他们设立独特的情境。对于非精英妇女在历史记载中被抹去这种情况，许多历史学者感到有义务将之恢复原貌，尽管在这里谁让谁“发出声音”是一个复杂的问题。¹⁴ 对比之下，人类学者则不透露他们资料的出处，通过民族志式的描述、而非直接命名的方式，为研究对象设立独特的情境和共同的文化预设。¹⁵ 在中国农村进行田野调查，除了学科实践之间的差异之外，还要算上不确定性：某个时候某级权力部门的官方批准紧接着就可能被令人不安的指控推翻。说出还是不说出受访妇女和她们社区的名字？虽然我们征得了受访妇女的同意，可以在书中用她们的原话和名字，但是不确定性来了：她们知道自己同意的是什么呢？书的出版以及这些故事的快速流传散播会不会反过来给她们或她们亲人所在的地区带来困扰、政治麻烦或个人痛苦呢？这些都是留给我们要去考查的问题。我们也想尊重她们关于自己成就的陈述。我们想了解，那些前妇女劳模或积极分子们是如何渴望利用从前事迹中遗存下来的贫乏社会资本，公开为自己争取回生命的价值。

经过多年的讨论，我们决定隐去各个村庄的名称，用大写的英文字母来替代。除非是公众人物，比如劳模曹竹香、山秀珍和张秋香，其他妇女的名字都一律用化名。曹竹香在地方上很有名，张秋香则全国闻名；许多已发表的文件和档案材料——有些引录在本书中——证实了她们的名气。与她们的访谈记录补充和丰富了文字资料的不足，并且应该不会给她们和她们的社区带来问题。尽管如此，如果我认为故事的具体内容会给这些妇女或者她们的亲人带来烦扰，我有时便更改或回避故事中的名字。

¹³ 陕西省丹凤县交通局 1990 年：第 7 页给出了这段路程的距离。此路于 1966 年沿一条人行小径的路线修建而成。本书描述的主要事件都发生在 1966 年之前。

¹⁴ 贺萧 1997 年，第一章。

¹⁵ 达德里（[Dudley] 1998 年）对口述史和民族志各自不同的做法作了深刻的讨论。

叙述和记忆

口头叙述既是社会也是个人的产物。我们采访过的村庄，关于我们的信息不断地在村里流传，先接受访谈的妇女免费给后来的受访者提建议，告诉她们我们对什么有兴趣，后接受访谈的妇女则抱怨先前的受访者歪曲了她们的形象，如此等等。我明显的外国人的特征、以及高小贤作为一个为政府支持的“群众”组织工作的城市女性的身份，都在一些具体的方面影响了我们的访谈。我们对交流中有这种影响因素的地方投入了大量的关注。然而，对许多受访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有人对她们那长久以来被忽视的故事感兴趣，且她们还有机会跟这个人交谈。¹⁶

在我们第一次访谈前，对于想知道的事情，我和高小贤除了各自拟有清单外，还一起列了清单。由于我们想了解每个妇女将哪些事情看作是重要的，所以并没有在开始一次访谈时给太多提示。¹⁷我们通常都是简短地介绍一下我们的研究项目，让每个妇女陈述自己的生活，并对她们一开始说的事情进行跟进。一些妇女讲的都是些标准的“解放前吃苦，解放后享福”的故事。其他的则语无伦次地东拉西扯，不知道这个问题是跟她们年老体弱、对访谈感到紧张有关，还是跟我们没有解释清楚有关。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一个妇女一坐下便热情洋溢、滔滔不绝地讲述一些困扰她自己的、很可能跟 20 世纪 50 年代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比如成年儿子待她不好、几年前死去的孩子、文革期间受到的屈辱、80 年代做生意失败等等。即使一个妇女讲述的关于 50 年代的故事是清晰并具体的，她也经常中断故事，不断提及自己生活的艰辛和遭受的苦难，弄出了一堆将 50 年代同其后的时代、最后又同当前的忧思都搅和到一起的杂芜的陈述。我们通常都跟随讲述者的叙述，同时试图扩展有关 20 世纪 50 年代的问题范围，从而尽可能地引出最丰富的陈述。有时我们也问自己，我们所谓的不要强加分类的做法，是否其实是在强行施加一个大的分类请求：当妇女们并不习惯于从她们的生活中创造出一个叙事结构时，我们却要求她们要这样做。由于高小贤也是一个外人（虽然是不同意义上的外人），我们将我们对所访村庄的不同视角来检验受访者的叙述，这种三角交叉检定法使我们获益良多。随着我们不断地讨论和争论我们学到了什么以及怎样组织谈话，我们提的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这就意味着，没有哪两次访谈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虽然它们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关于访谈的哪些部分被选录进本书的问题，我尽量做到忠实原内容，但是有时我也对摘录的内容进行重排或编辑，以消除重复、增加可读性。我意识到，口头叙述重复和饱含情感的特质，以及一个故事的节奏、重点和声调，都会在转换成文字形式的过程中遗失。要在叙述者的身体和现场表现力都缺席的情况下传递出访谈的强度和基调，则不仅需要关注故事读起来怎样，还要关注它曾经听起来是怎样的。

记忆不是“真相”的储藏室；正如法国历史学家 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所说，记忆不只需要建立印迹，还需要对这些印迹进行重读。¹⁸随着叙述者活跃地创造新的意义，记忆似乎也在任何需要的时候被重新创造。必需

¹⁶ 三本研究中国妇女的口述史的著作是杜芳琴 1998 年、李小江 2003 年、张晓 1997 年。

¹⁷ 欧克里（[Oakley] 1981 年）对将访谈妇女作为一种女性主义实践作了讨论。

¹⁸ 勒高夫（Le Goff）1992 年：第 52 页。

不断地重新排列人们对所记得的事情的理解，记忆的色彩才有可能改变。¹⁹每一种叙述都会带来遗失，因为当记忆被再次开启和重新放置时，它已经远离了感官经验和讲述者先前对一个事件的理解。然而与此同时，每一种记忆都是一种创造——未必是全新的发明（尽管也有），但却是过去事件与现时的特定情况汇集的产物。亚里桑德罗·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写道，对历史学者而言，口述资料的价值“不在于它们保存过去的的能力，而在于记忆所能引起的变化。这些变化揭示出叙述者如何企图理解过去并为他们的生活赋予一种形式。”²⁰人们所记忆的事情是历经持续的修改、重述、发明、有时是小心防守的沉默后的产物。这些都帮助塑造了所说的内容。²¹

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或在选择什么该说和什么不该说的过程中，妇女们可能只记住了有关自己的某一方面。反过来，由于我们提问的时候所知不够，她们可能忽略了一些对她们的人生非常重要的事。一次，我们对 G 村一位妇女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询问关于她在 50 年代离婚的事情，获得了十分丰富的信息。几天后我们得知，她和很多朋友都是那个时代热心的戏剧表演者。我们将她们召集到一起，问她为什么之前没有向我们提及戏剧的事情，她答道，你们没有问到的我都没讲。²² 尽管一个讲述者的阐释可能根深蒂固，亦可能被精心

¹⁹ 一个认知心理学家小组写道，讲述本身即塑造记忆：“通过语言详述事件的做法会影响事件在记忆中如何被组织、或在将来如何被忆起。”（彭尼贝克 [Pennebaker]、巴纳斯克 [Banasik] 1997 年：第 7-8 页）。

²⁰ 波特利 1991 年：第 52 页。

²¹ 心理研究学者们、历史学者们、文学研究学者们、人类学者们和其他此处不能一一赘述的学者专家们产生了浩瀚的关于记忆和口头叙述的著述文字。对本研究有助益的著述包括布洛克（Bloch）1996 年；范西纳 1965 年、1985 年；彭尼贝克、巴纳斯克 1997 年；波特利 1991 年、1997 年、1998 年、2003 年；阿敏 1995 年；波汉依（Bohannon）、西蒙斯（Symons）1992 年；布朗（Brown）、库里克（Kulik）2000 年；康纳顿（Connerton）1989 年；康威（Conway）1997 年；克鲁伊申克（Cruikshank）等 1990 年；王斯福 2000 年；葛里尔（Grele）1991 年；哈肯（Haaken）1998 年；希思（Heehs）2000 年；霍奇金（Hodgkin）、莱德斯通（Radstone）2003 年；胡伊森（Huysen）1995 年；科瓦克（Kovács）1992 年；兰姆伯克（Lambek）1996 年；拉森（Larsen）1992 年；聂尔瑟（Neisser）1998 年、2000 年之一、2000 年之二；聂尔瑟、哈西（Harsch）1992 年；聂尔瑟、利比（Libby）2000 年；帕塞里尼 1987 年；佩里利（Perelli）1994 年；皮勒摩（Pillemer）1998 年、2000 年；莱德斯通、霍奇金 2003 年；史华兹（Schwarz）2003 年；森格（Singer）1997 年；戴瑞福（Thaxton）1997 年；敦金（Tonkin）1992 年；沃茨 2002 年；怀特（White）、米舍尔（Miescher）、科恩（Cohen）2001 年；怀特（White）1998 年。关于沉默，见威斯维斯瓦朗 1994 年；怀特 2000 年之一、2000 年之二；帕塞里尼 2003 年；波兰特—麦考密克（Pohlandt-McCormick）2000 年。

²² 与雷彩娃的访谈，2001 年。范西纳（1985 年：第 62-63 页）写道：“研究者也应该认识到，人们做什么和要求什么通常会引起他们工作的整个社区或社会的兴趣。人们谈论它们，形成舆论，制造关于它们的谣言，有时甚至还会讨论如果被问这问那时该说什么。哪怕访谈是保密的——虽然在很多文化中往往不可能——受访者也会被别人热切地询问有关采访的内容。正如研究者会向其他学者汇报一样，受访者也会报告给他的朋友们。”

打磨过，但它们仍然产生于某个具体时刻，面向特定的听者。²³ 每当一个妇女回答或忽略我们的问题，告诉一些我们并没有询问的事情的时候，她不但是在创造她自己的故事来回应我们，同时也是与家人、邻居、生者以及逝者一起创造这个故事。这常常是一个诉说新苦旧怨、终结未了之事或抚平旧痛新伤的机会。

在听这些农村妇女故事的时候，我经常感叹这些故事受到的“污染”：它们被妇女们依据当下的忧虑讲述出来。或许，一个历史学者想要一种对过去的“纯粹”的报道是可以被原谅的。然而，简·范西纳（Jan Vansina）毫不客气地提醒我们，这种纯粹“从来未在任何社会出现，或许只会出现在职业的历史学者当中。所有的信息都有某种跟当下相关的意图，否则它们就不会在当下被讲述”。²⁴ 对此，莫里斯·哈布瓦赫在 20 世纪 20 年代更为诗意地写道：

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但正是因为这些记忆是一种重复，正是在我们生活的不同时期，这些记忆依次不断地卷入到非常不同的观念系统当中，所以，记忆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形式和外表。这种记忆并非是动物化石中保存完好的脊椎，可以凭之就能重建包含它们的整体。人们不如把它们比作在某些罗马剧场里找到的那些安置在里面的石头，在非常古老的建筑中，这些石头被用作原材料。它们是不是年代古老，并不能通过它们的形式和外表来判定，而只能通过它们仍旧显示出已被磨蚀的古老特征的痕迹的这么一个事实来判定。²⁵

本书既关注被“磨蚀的痕迹”，也关注这些痕迹现今支撑的新建筑。本书的形成受到两方面张力相互作用的影响：一方面是叙述时间和记忆的顺序，另一方面则是历史本身有序化发展的习惯。本书并非绝望于 20 世纪 50 年代故事叙述中的矛盾及不连贯之处，而是提问我们能从这些矛盾中学到什么。²⁶ 路易斯·怀特（Luise White）在描写二十世纪非洲吸血鬼故事盛行的现象时，重新界定了叙述“错误”这个问题：“这些故事中的不准确之处也罕见地成了真实可信的历史材料：它们为历史学者提供了一种像说书人那样看世界的方式，这样的世界脆弱并且充斥着不合理的关系。”²⁷

²³ 波特利 1991 年、1997 年、1998 年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令人生畏的、有说服力的延伸讨论。

²⁴ 范西纳 1985 年：第 91-92 页。亦见胡伊森 1995 年：第 3 页。

²⁵ 哈布瓦赫 1992 年：第 47 页。

²⁶ 波特利（1991 年：第 256、199 页）提醒我们，“口述史学家们将谣言、舆论、信仰、价值判断、甚至谬误都视作口头材料具有独特用处的一部分……矛盾之处以及控制这些矛盾的文字策略透露出许多关于文化态度和权利关系的信息”。他继续道，“这就是为何更正确的说法是‘叙述’和‘叙述者’、而不是‘见证’和‘信息提供者’……‘叙述’表明意识到了文字组织、固有歧义和语言言外之意的作用，这些只有在丧失大量信息为代价的前提下，才不会那么模棱两可、含糊不明。而‘叙述者’则突出了说话者的在场”（第 256 页）。

²⁷ 怀特 2000 年之一：第 5 页。木克尔（Mueggler）2007 年在处理鬼故事时并没有用“不准确”这个词——或许是因为人类学者不会像历史学者那样为准确性的问题所困扰不已。

因此，口头叙述在特定的情境下产生，被我们的农村受访对象参差不齐地记录下来、选择性地记忆并巧妙地利用成对动荡不安的现状的隐晦评注。在当下讲述的关于过去的口头叙述之所以需要被看成当下的历史，正是在于这些叙述易变的特质，在于它们种种漂离旧有意义、寻求新意义的方式。口头叙述通过漂离和寻找新的落脚之处以适应新形势。这里的挑战并不是去固定一种意义或阐释，而是留意激发这些不断变动的意义和阐释的诱因。认识到农村年老妇女们如何在口头叙述中回击或者回避了如“农村社会主义”这样宏大的国家工程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我亦试图动摇那些宏伟的女性主义修复性议题。比如，在我成长为历史学者的过程中，一个宏大的女性主义修复性议题是：关注妇女生活，使“不可见的成为可见的”。

本书既依据文字记载去关注口头叙述，亦依据口头叙述去关注文字记载。通过比照另一个人的叙述去阅读某个人的叙述，比照另一个社群的叙述去阅读某个社群的叙述，比照人数少得多的在世男人的叙述去阅读妇女的叙述。这样的研究计划不但展现了常见的组织上的难题，还要求要同时留意国家的和个体的时间，而不是假设这两者是完全分离的。本书既关注那些隐藏了情绪或者缺乏情感的叙述，也关注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既关注叙述中的谎言和静默无声，也留意其中激昂的事实论断。更重要的是，本书要求我们尊重口述资料的局限性和遇到死胡同的情形——虽不情愿，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妇女的声音没有为隐藏的历史提供直接线索，口头叙述跟其他任何可获得的、关于过去的片断一样，都受到“污染”。我们要对这种“污染”培养兴趣且保持尊重。最后，我坦诚，本书体现了我作为聆听者、写作者和教师的历史关怀：我希望这些故事变得重要起来，让读者忘不了，并让人们对“大历史”有不一样的观感。

运用口头叙述的人们有时对它们的功能作出区分：要么运用它们去获取具体的信息，要么用它们去关注叙述的结构、省略、静默、不透明之处和谎言——实质上是进行文本细读。本书同时兼顾这两种功能。通过从访谈中挖掘信息，我寻找这些彼此间素不相识的妇女们所重复的共同主题；我也着迷于故事讲述中那些呈现了美好、痛苦和清晰度的独特时刻。接下来的章节既关注（我们的和她们的）困惑与不安，也关注那些情况，即妇女们告诉一些我们没有问并认为无需知道的事情的情况。

记忆的社会性别

记忆有社会性别吗？如果有的话，它看起来像什么？听起来又像什么？我们如何知道是叙述者的社会性别，而不是她们的农村身份、个人境况或一系列其他因素，影响了我们所听到的故事？影响了我们对一个事件是否值得记忆和讲述所作的评断？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农村，记忆能对我们说出什么样的、关于社会性别作为一条权力、差异、依恋、不满和集体的轴线的故事？记忆或许没有社会性别；这样的提法将社会性别假定为一成不变，而不是一套不断变动的社会和象征关系。但记忆是一个社会过程，受到不容忽视的、性别的社会差异的影响。²⁸

²⁸ 其他地方对社会性别和记忆，社会性别的记忆，记忆中的社会性别等议题及相关议题作出的重要讨论，见帕塞里尼 1987 年；海姆密尔顿（Hamilton）2003 年；勒德斯朵

在谈论 50 年代时，妇女回忆的事件跟男人回忆的事件有交叠重合，但前者并不是对后者的简单复制。这不奇怪。国家有面向妇女的特定政策。劳动分工不断变化，既受到国家运动、也受到地方预期的影响，并继续对哪些任务适合男人、哪些任务适合妇女作出区分。即使同处一家，女孩和妇女的日常生活也跟男孩及男人的不一样。如果不牢记社会性别，我们便无法看到妇女的劳动，包括被认可的和未被察觉的劳动，是如何塑造了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

相比男人的故事，我们从妇女那里听到的故事跟国家运动时间的关系更为疏远。妇女们在四十多年后的访谈中忆起她们的生活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重复或改变、挪用或推翻、忽略或放大了运动时间。当然，并不是所有妇女都以同样的方式记忆；个体之间、社群之间的差异很重要，她们参与政治的程度也同样重要。但当男人们几乎都按教科书般规范的顺序，向我们列举一系列的政治变革时，妇女们却更有可能弄混公历年份，更改事件的顺序或名字。这样的重组不应该被理解为错误，而应理解为对带有社会性别特征和指向的过去的阐释。

国家话语提供的最为明显的时间分界线是“解放前”和“解放后”。20 世纪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的土改时期，妇女被动员去“诉苦”，叙述和解释她们童年和年轻时经历的苦难。她们还被组织加入扫盲班和互助小组。透过这些新做法，妇女被鼓励去将她们的记忆和个人故事放进“解放前的苦难”和“解放后的机会”这两个类别中去。用来表示 1949 年国家权力变更的“解放”一词很快成了中国农村地区日常用语的一部分，使用这个词本身也暗含了对事件的一种特定理解。将“解放”作为一个人生命中的路标意味着，要同时将这个人的记忆纳入对解放进步的个人叙述和集体叙述中。

然而，像所有霸权词汇一样，“解放”一词也被迫与原定的语境相脱离，其多样的使用方式嘲弄了国家官员的意图，哪怕这种嘲弄并非有意。例如在官方的国家词语中，“旧社会”是指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的任何时候，“解放”代表了“新社会”的开始。²⁹有些妇女依照国家话语用“旧社会”一词去指 20 世纪 40 年代。有些则说旧社会一直持续到 1963 年左右“大跃进”饥荒结束的时候，囊括了整个我们试图要考查的时期。一位对另一个社区的农村妇女进行访谈的中国调研者发现，有些妇女使用的“旧社会”，并不是指 1949 年以前的时期，而是指 80 年代早期经济改革之前的生活。³⁰她们这样做，其实是将常见的官方“诉苦”描述——“回忆（革命前）的苦，品尝（集体化时期）的甜”进行了再加工。³¹与之前的官方“诉苦”描述相反，妇女们用“旧社会”来哀叹集体化时期的艰难处境，这种处境与改革开放时期的富足形成对照。

由于“旧社会”一词的意思其实早在经济改革发生的前三十年就已经非常确定，所以这种滑稽就显得格外有趣。这些受访者不大可能仅仅是忘记了这

夫（Leydesdorff）、帕塞里尼、汤普森（Thompson）1996 年；布鲁克尔（Brücker）1996 年；皮斯切特利（Piscitelli）1996 年；怀特 2004 年；泰 2001 年之二。

²⁹ “旧社会”和“新社会”两个词语并非由共产主义的党和国家首创，尽管这两个词在 1949 年后被广泛使用。它们亦见于 1947 年国民党一本面向青年人的教科书中。书中一篇关于提升女子地位的课文写道，“在旧的社会，男子与女子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因此两者在法律前亦不平等。在新的社会里，女子可参加社会活动，享受与男子相同的权利和义务”（《青年成人用国民常识课本》（下）1947 年：第 3 页）。

³⁰ 王国红 1993 年。

³¹ 有关城市背景中的这种再加工现象，见何荣宗 2004 年。

个词的基本意义。她们将年代顺序与事件进行的重新结合是她们阐释自己过去的线索，并以曲解官方用语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重新结合显示出一种对集体化时期露骨的批判，因为“旧社会”一词的意义——就如官方用法设定的一样——仍然是彻底的贬义。通过“记错”国家时间，国家语言转而被用来反对国家——这种“记错”的情形在我们访谈的男人中不常见，但在妇女中却远为普遍。

在农村地区，运动时间的聚焦点是农业生产如何被重组进日益壮大的集体中。标志性的运动有土改、互助组、粮食统购统销、初级生产合作社、高级生产合作社、“大跃进”、三年灾害（这是一个明显的事件，而非运动）。这些运动对男人和女人們的日常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大部分男人按照运动来叙述他们的记忆（妇女劳模有时也这样做），而一般妇女组织她们过去的故事的方式却很不一样。她们可能记得运动的名称，但却会更改它们的顺序或内容。这种情形本身通常向我们表明了她们哪些记忆是重要的。

例如，所有我们访问的妇女们都知道“大跃进”这个词，却没有人会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用这个词。她们没有把“大跃进”看成是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现象；她们为运动时间创造了一个地方版本，把“大跃进”分解成对她们有意义的组成部分。她们说起“我们炼钢的时候”或“我们吃集体食堂的时候”——其实说的是当时的一项政策措施：人们砸碎家里的炉子、铁锅用来炼钢，吃公共食堂的大锅饭，每天必须工作以换取食物。连续几个月的吃喝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场由政府引发的持续数年的大饥荒。这种分解表明，虽然国家政策对农村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决定什么被记忆或被遗忘的，并不是与之相关的国家发展目标，而是家庭的组织方式和社会性别的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变化。

类似地，G 村的妇女们在提及“大跃进”的饥荒时，用的也是这样一种带有地方特色的方式。国家的大事年表通常将这场饥荒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但是 G 村的人们把它叫做“以南瓜和蔬菜作为替代品的低标准的三年”。这种说法其实源于 1960 年的一项紧急政府指令——“瓜菜代，低标准”。这项指令号召人们吃南瓜和蔬菜以应对主粮的短缺，是一项明显的针对食物匮乏的补救措施。（一位历史学者指出，其实，在饥馑遍地的中国广大农村，早已无瓜无果，百姓且已把树叶、树皮、野菜、观音土吞进肚里。）³² 妇女们用特别的措词和平静的语调把运动和饥荒分解成具体的、影响了她们日常生活的要件。国家话语给了人们强有力的新词汇，人们用这些词汇去记叙他们的过去。在每一个事例中，妇女都革新了这套词汇。

社会性别不能解释所有这些滑移和重组的形式。（文革期间，下放到农村地区的“下乡”青年常讲的一个故事是，一些年长的农民被组织去给新来的人讲他们过去的苦难经历，但他们讲的不是 40 年代的事情，而是“大跃进”时的大饥荒。这种做法吓坏了村里的领导干部们。）但运动时间中的里程碑事件在男人的故事中的地位比在妇女的故事中重要得多。我们访谈的男人大多担任过会计、簿记员、或队长等村职。他们更自如地转换代码，更少谈及孩子，对政治生活里的运动时间记得更完整——或许是因为他们更全面地参与了运动时间。大多数妇女的生活与国家工程发生关联的方式跟男人們的很不同。妇女们似乎并没有像男人们那样完全地吸收国家话语，而是对其进行了明显的挪用和

³² 高华 2005 年：第 162-63 页。

修改。直接地说，农村妇女在她们的个人叙述中命名了一种时间，这种时间不同于农村男人们的时间。

要超越运动时间的框架去书写关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历史，需要考虑到运动时间带来的专门用语和巨大变化。但也必须提问，什么是农村妇女们善于铭记的，什么又是她们学会了遗忘的。国家时间和其他理解时间的方式共存。婚姻时间区分了妇女早年在娘家的生活和嫁进新家后的生活。妇女们按照阴历月份回忆一些重要的事件。抚养孩子及由此带来的特定需求也是记忆的一个主要标记。运动时间明显有助于组织集体化时期妇女的记忆，但却没有完全囊括这些记忆。在有一个地区（第九章会详述），妇女们起初好像忘记了集体化时期的最后二十年——我将这种记忆模式称作“时间的皱褶”。³³ 依据多重时间来进行思考是很有必要的，尽管这会让热衷于排序的历史学者们感到不舒服。这些多重的时间互相重叠、交织，并在横向层面上受到社会性别、婚姻、政治行动和年龄的影响。静默、对时间的省略、和爆发性的记忆是创伤之后的结果吗？还是去政治化的结果？抑或是极度疲惫和忙于日常劳动的痕迹？

妇女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记忆：按她们孩子出生的年份标记时间，这些年份则是依照十二生肖（鼠年、牛年、等等）来排列的。我们没有从男人那里听到这样的记忆方法。妇女们搞不清或记不住集体化时期的事件，但却能准确地说出她们每个孩子出生那年的生肖。十年后的 2006 年，我们让 B 村的三个妇女根据生肖去组织事件发生的顺序。我们准备了十二生肖的图画，在旁边标明公历年份，让她们把过去几年讲过的事情再向我们描述一遍。有些是全国性的事件，如建立合作社；有些则是当地的，比如，一次，一个满怀嫉妒的破坏者企图败坏曹竹香的名声，便往他自己卖的豆腐上撒盐，并告诉大家这些不能吃的豆腐是曹的合作社做的。当我们说出每个事件的名字，每个妇女都能把这些事件跟她孩子出生的时间对应起来。当我们给出十二生肖时，一系列“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的回答就转化成了确定的大事年表。

这种记忆和语言分离的情况，以及根据孩子出生年份去记忆历史的倾向，都不是“自然”生发的。³⁴ 我们一开始便提供了生肖的图画。高小贤评论道，同有关我们访谈的其他许多情形一样，“如果我们没有问，我不确定她们会不会自己用这个方法。她们不可能这么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时间感。我们用这种方法帮她们把故事纳入不同的时刻。”³⁵ 然而，我们选择提供生肖正是因为之前多年的访谈经验告诉我们，当妇女们被问起孩子出生的年份时，她们的回答都非常肯定，但我们问起公历年份时，她们都茫然不知。这种情形只对最活跃的妇女干部例外。这种分歧反映了，“男性”和“女性”是如何被加以区别地进行理解，他们的标准任务（包括那些跟孩子相关的任务）又是如何程度不均地在国家政策中被提及、在地方上被假设。

妇女们有特定的描述她们过去行动的方式。她们有时借用的是最近的革命英雄的形象。许多人都告诉我们乡村生活在各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受到 50 年代早期婚姻法运动的鼓舞，她们中有些要么挣脱了父母包办的婚约，要么终止了已有的婚姻；有些则坚持主张自己选择丈夫。她们从“冬学”中学习识字，

³³ 这个说法来自伦格尔（L'Engle）1975 年；有关进一步的讨论，见第九章。

³⁴ 关于这些相关问题的讨论，见盖普特（Gupta）1994 年。

³⁵ 我本人 2008 年 11 月 6 日与高小贤的交流。

受训为新式接生员，担任妇女干部。她们全部都参与了集体化的过程，经历了“大跃进”的热潮和困难，并长期和其他妇女一起在田里劳动，有些还成为了劳模。简而言之，她们青年时期的生活在可察觉的日常层面上带着国家政策指令的印记。她们认为自己不同于自己的母亲，且比母亲更幸运。她们中许多都将 50 年代与她们的童年时期进行对比：50 年代她们能在公共空间内活动，而童年时期能活动的空间和拥有的物质都十分有限。

不过，“诉苦”故事核心中戏剧性爆发的情形并没有出现在这些妇女的陈述中。相反，她们在讲述中不断地进行自我评定，不断说明自己无论在 1949 年之前还是之后，还是新近的改革开放时期，都不曾改变过：我没封建过；我一直都很能干；我努力让家庭和睦；我是个有原则的人；我一直都很好心。³⁶或以一种没那么积极乐观的口吻说道：我的生活在集体化时期很苦很惨，现在和解放前都很苦很惨。这些故事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借用了革命前女德的概念，对新近的革命提供的关于自我的范畴进行改造，并与之紧密交织在一起。³⁷ 妇女们强调的一些品质——勤劳、能干、能够灵巧地处理人际关系——都借用了“好女人”这一持久的文化概念，虽然这些品德发生的地点和社会场所都不再限于家庭中，并且还可能被用于服务集体。

“可怜”这一品质，尽管其本身不是什么美德，却是受压迫阶级的一个公认的特点，因此这种品质可用来联合具有革命美德的人。然而，在这些妇女们的故事中，“可怜”还暗含了其他的东西，即对国家和家庭没有认识到这些故事讲述者们作出的有美德的牺牲的一种隐晦的批判。

如果访谈是在 1955 年（或 1975 年、1930 年）进行，那么妇女们是否会使用相同的美德词汇？——这我无从知晓。我也无法追溯她们在其他时候对自己的评价，并将这些评价跟新闻报章或政策指令的词汇、或者跟运动话语的不同强度进行比较。由于农村妇女通常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而时间旅行也不是历史学者的工具，对于这套词汇在整个被认为是分界的 1949 年、乃至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的时间性问题，我所知的远少于我想知道的。美德是否在改革的困难时期再次流行还是一直都在？如果一直都在，又有那些细微的差别和改变？这些都是令人烦恼和不能确定的问题。

或许，妇女的叙述能够如此轻易地偏离常规的国家用语，是因为集体化时期的革命话语尽管详细规定了妇女应该是什么、做什么，却没有言及妇女在关键领域的日常生活。整个集体化时期，妇女被敦促外出到地里劳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渐渐地，她们发现自己不得不这样做，以争取足够的工分来养家。在家中，她们被告知要促进和谐的家庭关系。然而，除了那次短暂、灾难性的集体大食堂的试验外，家务劳动仍牢牢固定在家里，只有偶尔才在国家文件中被说成是注定要在无限遥远的共产主义未来消失的残余。妇女们可能不记得 50 年代及以后集体化的顺序，却清楚地记得在 70 年代初通电之前，她们在昏暗的灯光下熬夜为家人织布和缝衣制鞋的日子。70 年代之前，国家在降低婴儿死亡率上十分成功，加上基本不关注计划生育，使得这些家庭中小孩的数

³⁶ 有关受访者如何将自己展现为具有固定的身份，见帕塞里尼（Passerini）1987 年：第 4、17、21、27-28 页。

³⁷ 她们对自己美德的叙述并非集中在守贞上（虽然她们有时亦提及）。从这个方面而言，她们不同于帝国晚期和民国时期地方志或传记中常见的恪守妇道的贞妇。

量激增，孩子的母亲亦疲惫不堪。为孩子做衣裳的劳动刚好在家庭时间里展开，这在革命的中国农村是得不到公开表达的。

当妇女回忆起这些活动时，国家词汇毫无帮助；仅仅对家务活进行描绘也不足以说明新的、妇女们现在正在其中从事那些家务活的具有挑战性的环境。那么，妇女们不得已而去诉诸一种更古老的语言表达，即有关妇德的语言，这或许不会让人讶异。这套有关妇德的语言可以从数千年来地方记载的通俗故事中、戏剧中、和古典著作里的故事中找到，并在乡村演出以及（新近的）电视和录像中流传散播。在精心叙述自我在集体化时期的形象时——诸如她们曾是怎样的人、如何对待他人、别人又是如何对待她们等等——她们经常讲到怎样才算是一个好女人，以及作为一个好女儿、好媳妇、好妻子和好母亲，应该如何得体地处理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她们最经常挂在嘴边的美德就是勤劳、注重和谐的社会关系、能干——这些都与一个妇女干部或者劳动模范该有的行为相合。但是政治上并不那么活跃的妇女在也把这些品质纳入到对自我的描述中去。在搜寻故事和讲故事的语言的时候，妇女通过陈述那些明显不同于男人品行的美德来界定自己。甚至是在妇女展现英勇革命行为的轶事中：如深夜开完政治会议后，勇敢地大步走回家，跳进洪水泛滥的地里救庄稼，彻夜扬谷等等，这样的美德也是一股潜流。这里的悖论是，试图积极改造妇女行为的、革命的国家语言——即社会主义模范女公民的语言——在这些故事中却如此彻底地让步于一套更柔韧的、古老得多的关于妇女美德的话语。

老年妇女们在一个她们的寿命、自我理解和经济上的脆弱都为社会性别所塑造的时刻，叙述她们的童年、青少年和中年时期。生于 20 世纪 10 年代和 30 年代间的关中和陕南的妇女承受了不止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有时从这些变化中获益。她们的故事凸显出，在跨越几十年的政治变革后，什么是她们认为自己所拥有的经久不衰的美德、所取得的重要成绩、以及心中所深怀的不满。她们在混乱的时代中长大成人，她们童年的故事中充斥着土匪和士兵（两者并非总是可以辨别）带来的身体和性的威胁，并不时穿插着逃离饥荒和人贩子的情节。她们成年后的大部分工作时间都是在各种集体中度过，她们对那个时期的记述包含了各种故事线：个人的成就、周期性的组织混乱和社区的不满、照顾一大家子人穿衣吃饭等让人麻木的家务事。

二十一世纪初期，距离经济改革开始废除集体农业已有二十五年之久，“集体记忆”在对一段共有时间的叙述中得以形成、通过一系列共同的习俗被唤起、并在与其他习俗的交流中得到进一步完善。³⁸更直白地说，正是一个生命在集体、社会形态内的记忆使日常工作、政治、人际交往有了框架。如果回忆集体化的过去需要将自身放入集体的视角，那么妇女必须将她们自己放置到

³⁸ 哈布瓦赫（1992 年：第 38 页）解释，“人们在阅读一些关于记忆的心理学的论文时会惊诧不已，因为这些论文将人们视作孤立的存在……然而，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够回忆、识别和对记忆进行定位……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有在为了回答他人的问题，或者回答我们设想他们可能会提出的问题时，才会诉诸记忆……在多数情况下，我之所以回忆，正是因为别人刺激了我；他们的记忆帮助了我的记忆，我的记忆借助了他们的记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有关集体记忆，见伯亚林（Boyarin）1994 年之二：第 26 页；克兰（Crane）1997 年；康菲诺（Confino）1997 年；彭尼贝克（Pennebaker）1997 年；沃茨（Wertsch）2002 年。

与一个团体的相互关系中去。虽然那个团体已不复存在，但她们却曾在其中度过了青年时代和成年后的大部分日子。

我们访谈的妇女必须接纳一部复杂的政治史。她们在国民党政权下度过童年，这个政权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者们的彻底批判。但是，尽管共产党政权关于通过集体化实现发展和平等的诺言开始变成空话，尽管集体化本身已经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并已改头换面为“市场社会主义”，这个政权却没有遭受到毛以后的领导班子或大众舆论的批判。集体化既需要强大的干劲，又需要每天高强度的工作。集体化解体二十年之后，妇女在回忆这些成就的时候已然非常清楚，集体化所承诺的经济上的富足并未实现。³⁹ 她们回想起来，那些年里充斥的皆是无休止的田野劳作、家务活和生孩子。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的是，正如最后一章所考察的那样，年老的农村妇女们认为自己从随后的改革开放中受益，但同时也在其中居于不利地位。

虽然这些妇女们很少直接表露出对国家政策的不满，但她们说自己不但具备美德，还能满足国家和家庭的要求；当缺乏来自国家和家庭的支持和关注时，她们亦能应对一切。这些妇女用公认的美德的词语去建构一个记忆的自我，并坚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她们的品德都不会改变，这些做法与更广阔的政治变革形成鲜明对比。她们对这种政治变革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变革太快、太彻底了，有的则表示，变革还不够快、或不够彻底。

虽然妇女们认为，与过去的集体化时代相比，当前经济改革时期的生活要好得多，要从事的劳动也少得多，但她们在讲述过去的时候，还是对自己曾经的能力满怀自豪。她们现在已失去这些能力。她们的故事中也充满了对儿子儿媳的怨怼之情，他们不理解也不珍视她们过去的牺牲，亦不会回报她们。得不到明确的赡养、感情上遭到的背叛、有时甚至受到明目张胆的虐待——当下的这些处境总是影响着她们的记忆、影响着她们面对带着同情的局外人时的讲述。她们的记忆可能是短暂的，注定很快要消逝，每一次在一个已无法辨认它们曾经重要性的当下被讲述，这些记忆引起的共鸣都不一样。在巨大的冷漠面前，年老农村妇女们在当下讲述的故事变成了一种“顶撞”，一种对具有社会性别特征和指向的记忆的公然肯定。

这也让我们回到了中国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是否有过革命这个问题。她们生活和理解的空间和时间在 50 年代经历了深刻的重组和排序，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答案是肯定的。然而，社会性别以特殊的、具体的方式，对她们的革命进行了塑造。她们的革命也不被理解为一种一成不变的人类财产，而是一系列实践的总和。这些实践被革命政策选择性地提及、忽略。这些资料要求我们关注其中的各种信息，那就是，曾服务于革命的美德如何在方方面面面对革命以及革命的后代们提出了批评。与社会性别相关的记忆对我们讲述一个有关中国新近过去的、“足够好”的故事至关重要。

³⁹ 有关其他地方的后社会主义记忆，见玛莉思娃（Malysheva）和贝尔托（Bertaux）1996 年；斯加尔坦斯（Skultans）1998 年；泰（Tai）2001 年之一；肯纳夫（Kaneff）2004 年；沃茨 2002 年。